

「意識」與「自我」概念的形塑： 人文學與生命科學的碰觸

蔡英俊*

如果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思考，則當代所謂的優勢學科，從電腦運算普及所開拓的電機資訊相關領域及其衍生的關於人工智能（AI）與元宇宙，或從生理生物學演變到心智與腦科學的發展，都深刻影響到我們對於人自身各種認知的理解模式。人文學或社會科學要如何因應？這個問題又牽涉到當下強調「跨領域」知識學習與交流的重點方向。畢竟，我們學科所探索的領域與面向，即在於對人自己跟群體或社會的理解，因此，重新聚焦人文學自身所探討的議題、或可引領「跨領域」產生有意義的問題與方向，提供更多的知識訊息及參與可供討論的詞彙或用語。

2000 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肯德爾（Eric R. Kandel）曾主張「生物學與人文學之間的知識統合」，並引述演化生物學家威爾森（E. O. Wilson）的觀點，強調這種統合的可能性可立基於一組跨領域的對話，也就是透過「跨域契合」（consilience）來達成。今日，腦科學家正嘗試將有關人類心智中抽象的哲學與心理學的問題，轉譯為認知心理學與腦生物學的實證及經驗性的描述語言。當研究領域是自然形成聯盟時，對話最可能成功，如心智生物學與藝術知覺：心智生物學在藝術與知覺及情緒科學各面向之間找到新的互動，這些互動將會繼續啟發該二領域的問題意識，也會及時產生累積性的效果。至於這門「新科學」的可能性，乃是在於「經由其提供的直覺洞見，藉著連接研究心智的生物學與其他領域的人類知識，得以引導我們更深入瞭解自己，包括對觀賞與甚至包括創作藝術作品在內的進一步理解。」¹

就深入瞭解人自己的這個問題而言，1962 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克里克（Francis Crick）則揭示以科學的方法或實驗的方式來研究意識的本質、意識與靈

*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約聘研究員、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

¹ 肯德爾著、黃榮村譯（2021）。《啟示的年代：在藝術、心智、大腦中探尋潛意識的奧秘》，第 32 章：〈認識我們自己——藝術與科學之間的新對話〉，頁 486，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魂之間的關係、乃至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這些提問在性質上是屬於自我認知的層次，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領域所關心的主要問題。克里克主張意識其實有許多種形式，「包括了那些與看、思考、情感、和疼痛等等有關的幾種。至於自我知覺，大概是一種特殊的意識」，並且試圖「用神經細胞（或與其他細胞）之間的交互作用、及和它們有關的分子來解釋」，也就是一群神經元及／或分子的行為，簡單說，一切可能都是神經元的傑作。²然而，由於意識的活動牽涉到諸多因素的交互參與，克里克的研究就選擇從視覺意識著手，一方面是因為人類是視覺的動物，視覺的輸入有一定的結構，很容易控制，而且視覺也提供特別生動和豐富的資訊。

至於意識產生的起點，當然是透過身體的感官知覺而形成的，引發了各種感覺與情緒，其過程需要專注活動的聚焦及短期記憶功能的累積——因此，很顯然的，這些來自腦神經科學實驗室所提示的概念及其說解方式，對於人文學科的學者而言，並不算陌生，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回應這種來自實驗室的觀察與提法？我將試著從當代知識語境所提示的理解及其論述方式，尤其是哲學與腦科學的探問方式，進行與文學研究領域中相關概念的比對與說解，藉以指明在「自我」或「意識」的概念範疇底下可能開展的新視域及其研究課題。

我們這一世代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者的潛在思維，在於確立古典文學在學術研究上的性質、自主性及其可能的價值，這就涉及當前整體的研究氛圍及其指標的設定，乃至於在學術評比的可共量性及跨領域對話的可能性。作為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我們要面對兩個不同層次的「語料」，一是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所指向的相關材料及其議題，一是當代知識語境可以提供的相關概念及其解析說明的方法。於此，我提出的新趨勢的展望將集中在「意識」與「自我」這兩個概念所可能涉及的問題及其研究方向。在當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論述場域中，「自我」已是我們熟悉常見的概念，似乎不辯自明，而「抒情自我」與「敘述自我」的分辨，則更深化了探問與討論的深度與複雜性，但這些概念也涉及倫理學與美學的研究範疇，顯然需要置放在相關的理論框架中加以闡明。

在文學研究場域中，「自我」概念的論述語境：「個體」或「自我」的概念所以出現，自有其作為參照或對比的脈絡或語境。就古典中國文化而言，魯迅在1927年提出曹丕所代表的魏晉時代是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這種提法或許來自日本學者鈴木虎雄在1920年所揭示的「魏晉時代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何

² 克里克著、劉明勳譯（1997）。《驚異的假說——克里克的「心」、「視」界》，參見第一章〈通往意識之路〉及第二章〈意識與靈魂〉，臺北市：天下文化。

謂「自覺」？相對於什麼而言？余英時曾主張魏晉時期見證了「個體自覺」意識的到來，這顯然是將「個體自覺」的概念置放在漢代思潮所建立的「群體自覺」的連續性。³ 何謂「群體自覺」？具體指涉又若何？於此，余英時所指稱的群體，乃是針對士大夫在政治、經濟面向上所形成的社會階層，更是相對於其他的社會階層而來，譬如外戚與宦官。就此而言，所謂的個體自覺可以表現在許多不同的場域，藉此突顯個體具有的自由、獨立性與風采，但這種個體的自覺或可能不僅是士大夫群體意識的延續，而是針對東漢帝國意識形態所規範的綱常倫理的約束，也就是與個人相對的群體性或集體性，而這種社會群體性其實是有著更為細緻的表現型態。我們可以從歐洲思想史中的兩份論述作為對比、考察的案例，藉此檢視關於「個體或自我」概念的發展歷程。

歐洲的中古時代，所謂的人類自我意識所得以展現的兩個層面，亦即對於外在世界的意識及自我內省的心靈，似乎同時被一層薄紗籠罩住，以致自我意識顯得如在酣夢中或處在半睡半醒的狀態。隔著這層薄紗往外看，外在世界與過往歷史都染上了神奇迷離的色彩，個人只能透過種族、民族、黨派、組織、家庭，以及其他集體形式的框架來理解並且認同自我的存在。⁴ 及至義大利，根據布克哈特在其重要的論著中的觀察，義大利可說是最早以客觀的眼光來看待及處理國家以及現實世界所有的事物；但同時，在對於個人主觀性的尊重上，他們也有強力的發展：人成為具有精神意義的「個人」，而且也以這樣的方式自我認知。接著，在該書第四卷中探討所謂「發現自我」的章節中，布克哈特揭示了幾個重點：詩歌對人類心靈的描寫、傳記寫作的進展、對各地人民與城市的描述、對人物外貌的描述、對生活動態的描述等面向。這種種表現關涉到文藝復興時期作家或書寫者身分的認知，也就是「現代性」自我身分與認同概念的浮現。⁵ 至於加拿大籍的學者泰勒（Charles Taylor），則試圖解析西方在近三、四個世紀以來所形成的「現代性身分（認同）」的發展歷程，也就是對於人的「主體性」的理解過程，而這份理解即包括了所謂內在感、自由、個性，以及根植於天性、且跟自然在新定位中人自己的存在。就泰勒而言，現代人所謂的內在性即是帶有內在深度的我們自身的感覺，以及我們是「我們自己」的連結性概念；其次的特徵，包括了由現代性發展的早期階段逐一開展而來的對「日常生活的肯

³ 余英時（1980）。〈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收錄在《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尤其見頁 231-275，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⁴ Colin Morris. (1973). *The Discovery of the Individual: 1050-1200*.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⁵ 布克哈特著、花亦芬譯注（2007）。《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相關論述分別見第二卷：〈個人的發展〉、第四卷：〈發現外在世界與人類的自我〉，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定」，以及作為我們內在道德根源的「抒情或表現主義者的天性（the expressivist notion of nature）」的主張。⁶ 泰勒強調除非我們弄清楚關於自我的現代理解是如何立基於歷史情境中人的身分認同，否則就不能把握這「現代性自我」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整體而言，任何概念的出現與形成，總是透過跟一連串相似或相反的概念與語詞的對照而來，而諸多概念之間的「對照」或「差異」，即此成為我們描述或解析某一特定概念的參照框架。當我們試圖重新認識並理解中國古典文化歷史發展中所謂「個體或自我」的發現，乃至於闡明近、現代以來政治社會變革中有關個體或自我的定位，不免必須回溯這等概念所以在思想文化發展上的具體場景及其可能指涉的內涵。

在這樣的視域下，當代心智生物學對意識與自我的論述，引發了另外一個面向的開展，亦即「自我」在個人身上是有階段性的演化歷程。美國心理學與神經學的學者達馬吉歐（A. Damasio）即指出，當自我在心智中浮現，當大腦在心智的混合物中加入自我形塑的過程中，有意識的心智也就啟動了；自我是在以「原我（proto self）」為基礎的不同階段中逐步建立的。第一步是原始感覺的產生，也就是自發地從原我中湧現的存在的本基本感覺。接下來則是「核心自我（core self）」的出現。核心自我關乎行動，更明確地說，是關乎生物體和對象之間的關係。核心自我是在一連串的圖像中逐漸顯露出來，而這些圖像描繪出一個對象，它占據原我並修正了那個原我，包括其原始感覺。最後則是「自傳體自我（autobiographical self）」的存在：這個自我，由屬於過去及預期未來的傳記知識所定義，而多重圖像的整體定義了傳記的實質內容，並且這些多重圖像更產生了核心自我的脈動；這些脈動的集合構成了自傳體自我。帶著原始感覺的原我及核心自我構成了物質的我（material me），而自傳體自我的高層包括人的社會人格（social persona）的所有面向，它構成了「社會我（social me）」及「性靈我（spiritual me，精神我）」的存在。我們可以在自己的心智中觀察自我的這些面向，或者在他人的行為中考察它們的作用。無論如何，我們心智中的核心自我及自傳體自我構成了一個「知者」；換言之，這兩種自我始賦予我們的心智形成另一種主體性。⁷ 再者，不論是克里克或達馬吉歐，在探索自我與意識的形塑過程中都牽涉到「記憶」的問題，這更是一項有趣而可以再行深入探討的問題，而

⁶ Charles Taylor. (1992).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⁷ 達馬吉歐著、陳雅馨譯（2012）。《意識究竟從何而來？——從神經科學看人類心智與自我的演化》，第一章：〈覺醒〉，頁 30-34，參見該書第九章專章所討論的「自傳體自我」的相關問題，臺北市：商周出版。

腦神經科學在這個領域上已有豐富的成果累積，亟待不同學科領域相關的學者能夠促成另一波的對話。

達馬吉歐所指出的這份關於自傳體自我的概念，或可提供我們更為寬廣、也更深入對於自我此一概念內涵的掌握與認知，藉以理解文學研究論述場域中關於「抒情自我」所指向的單一視角的深邃性，以及「敘述自我」可能揭示的多重視角的多樣性。這或許是跨領域知識探索所可能指向的一種新趨勢。

最後，請容許我以個人的一個教學經驗作為案例，闡明在大學教育的現場進行「跨領域」學習的可能性及其具體的狀況。國立清華大學分別在 1984 年與 1985 年成立人文社會學院與生命科學院，由於先後成立的這兩個學院分別座落在校園主幹道的兩側，因此，當時創院的李亦園院長與黃秉乾院長即認定兩個單位或可共同開設相關的課程，促成教學與研究領域上的相互對話。這種互動確實開啟了跨領域學習的可能性。最近這兩年，生科院的江安世教授與我一起合作，在人社院學士班開設開放通識選修的大學部課程：「意識、記憶與腦科學的解釋」，這門課是建立在三種專業知識的基礎上：腦神經科學、人文學，以及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江安世教授將他個人在實驗室觀察得到的實例引向腦科學相關的研究成果，我則從亞里斯多德以降關於感覺與靈魂的論述開始，觸及思想史關於自我與意識的不同界定與解說，彼此試著探討、深究「意識」與「記憶」的各項論點及其可能的提法，我們的對話在修課學生身上引發頗多新奇的問題。這兩年的經驗，讓我們深深感覺到跨領域的學習可以引向未來的可能性，儘管目前我們並不知道這種可能性會產生怎樣的結果，但總相信不同學科的學生在經歷這種對話互動的氛圍後，可能開始領悟到如何在自己學科的專業訓練下思考一個廣大而深遠的目標。無論如何，課堂上教學與問答的場景讓人看到希望。